

# 南宋三衙马政问题试探

范 学 辉

内容提要：三衙是南宋马政的中心，四川茶马司等所购得的优质战马，优先保证三衙尤其是殿前司的需要，并主要由三衙选派本部官兵自兴元府将“西马”马纲押运至临安，沿途州县则设有马驿，专门保障取马官兵和纲马的后勤供应。三衙战马的日常管理较为严格，实行定期集中牧放。南宋三衙马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衙战马的数量达到了二万余匹的相当规模，在提升三衙的军事实力，对外抵御金、蒙古，对内强化中央集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完全依赖购买，马源单一、受制于人更是其先天不足。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南宋三衙马政愈来愈趋向衰败。

关键词：南宋 三衙 马政

南宋骑兵的弱势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正如南宋名臣虞允文所说“况今日之事，敌以多马为强，我以无马为弱。强弱之所以异，三尺之童皆知之，马政其可以不议哉！”<sup>①</sup>宋理宗时黄榦上奏曰：“马政，国之大事也。”<sup>②</sup>宋高宗亦曾有言“兵以马政为先”、“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中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sup>③</sup>宋孝宗则是“留神马政，曲尽物情”<sup>④</sup>，曾颁下御札曰：“军机之务，马政为先。”<sup>⑤</sup>与金、蒙古等骑兵强国相对抗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南宋必须将马政问题置诸关系政权兴亡的战略高度，以尽可能地提升骑兵的实力。

事实上，从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南宋就以三衙为中心，以宕昌寨马场为三衙主要马源，兴元府马务为主要集散地，逐步形成了市马、分配、取马和马匹使用、牧放、管理、退役等一系列较严密的规章制度，从而在三衙组建起了二万左右规模颇为可观的骑兵部队。不论是在抵御金、蒙古等外敌威胁，还是对内

① [明] 杨士奇、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马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 黄榦《勉斋集》卷二四《汉阳条奏便民五事·五复马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四《兵门·马政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七月乙未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1页。

④ [元] 佚名撰，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六上《宋孝宗五》，淳熙三年五月癸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93页。

⑤ [宋] 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廷试策奏议》卷四《再论马纲状》，《四部丛刊》本。

驾驭江上诸军各都统司，强化中央集权，皆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因此，探讨三衙马政诸问题，既可以细化对三衙管军制度和南宋马政的考察，也是深化南宋军政体制研究的一个较好视角。但学术界目前的相关专题论述，却相对较为薄弱<sup>①</sup>，笔者拟从若干具体问题入手，试作初步的考察。

## 一 三衙为南宋马政的中心

按照南宋制度，三衙所需马匹的供给，主要由四川茶马司，部分由广西买马司，通过购买来保障。宋廷偶尔也令三衙自行派员买马，如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六月，就诏“差殿前司统制汤尚之前去四川等处买马，其合用钱，令四川总领所取拨银二万两、绢五千疋、钱引一十万贯，专充买马使用”；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正月，亦曾诏令殿前司“量差将官、军兵，于襄、汉州军收买土产马二百五十疋”<sup>②</sup>。但这些都属于较个别的特殊情况。

众所周知，南宋立国东南，由于地理、气候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尽管也进行了些许置监养马的努力，但无一例外地皆以失败而告终，只能是依赖从四川、广西等地向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购买马匹。特别是从四川购买西北地区出产的优质马匹，南宋始终将其放在了政权存亡所系的战略高度。绍兴九年（1139）宋高宗就曾对韩世忠说“不然。虏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少弛！朕方复置茶马司，若更得西马数万匹，分拨诸将，乘此闲暇，广武备以戒不虞，和议岂足深恃乎？”<sup>③</sup>绍兴十一年宋金“绍兴和议”签订以后，随着宋金对峙形势趋向稳定，南宋将四川茶马司进一步加以整顿和强化，在成都府和兴元府又分设了两个马务：成都府马务下辖黎、叙、珍、长宁、南平五个买马场，所购马匹称之为“川马”；兴元府马务下辖宕昌寨、峰贴峡和文州三个买马场，所购得的马匹称之为“秦马”、“西马”。南宋每年不惜投入巨额茶、锦、银、绢等，从八月至次年四月开场买马，年买马量通常保持在万余匹以上<sup>④</sup>，使得四川成为南宋最重要的马匹供应基地。广西买马场则设在横山寨，所购得马匹称为“广马”，年买马额约为一千五百匹上下，与四川茶马司相比数量要小很

① 现有相关成果主要见于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何忠礼等《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杜文玉《宋代马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等。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九、二三之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158、7171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六，第7196页。

④ [宋]王应麟撰《玉海》卷一四九《绍兴孳生马监》：“乾道秦、川买马之额，岁为万一千九百匹有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庆元初，合川、秦两司为万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两司为万二千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955页）

多，通常居于辅助的地位。

南宋从四川、广西所购得的战马，主要用于供给三衙和江上诸军。其具体的分配方案大致是：四川茶马司扣除供应四川宣抚司各部每年度二千匹之外，成都府马务主要对口负责江上诸军的供应<sup>①</sup>，包括建康、镇江、鄂州、荆南、江州和池州六大都统司；兴元府马务则主要对口负责三衙的供应，惟有宕昌马场“年额买到马十分为率，内拨二分”<sup>②</sup>供应四川宣抚司吴玠所部，通常为720匹。正因为如此，从绍兴三十年（1160）起，殿前司和马、步军司通常各选派本部“谙晓马性”的统领官一员，在宕昌寨等马场充任“监视买马”官，如隆兴二年（1164）殿前司即“已差统领官孟庆孙前去宕昌等处，同共监视买发”。其职权，是“监视拣选买发”，并将“买到马数并支过茶帛等数”<sup>③</sup>，与茶马司的买马官共同署名向枢密院申报。乾道九年（1173），宋廷又具体规定：三衙监视买马统领官“将带白直人兵二十人，鞍马二匹，预期前去西和州宕昌寨、阶州峰贴峡两处置马场”。至嘉泰三年（1203），南宋采纳了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的建议，令三衙监视买马统领官由宕昌寨改驻兴元府<sup>④</sup>。

宋高宗曾经强调说“川、广马到，朕未尝留，尽以均给诸军，若小不均，则谓朕有所偏。”也就是要求尽量遵循“均给诸军”、“分拨诸将”<sup>⑤</sup>的原则，把纲马匹平均分配给三衙和江上诸军。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兴元府马务每年购马约4100匹，要略低于成都府马务的5100匹。三衙年得马71纲，3555匹上下；江上诸军年得马80纲，4000匹上下，两者之间也确实基本做到了比较平均。但若具体到任何一个都统司，都已然与三衙殿前司和马、步军司有着较明显的差距。以绍兴十九年（1149）的配额为例，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南、鄂州各750匹，江州和池州各500匹，而三衙殿前司高达1500匹，马、步军两司也各为1000匹<sup>⑥</sup>。从宋孝宗乾道后期开始，兴元府马务年购马量逐步上升到了5900匹，业已与成都府马务的6000匹基本持平。宋宁宗庆元年间，兴元府进一步增长为6120匹，而成都府却下降为4896匹。嘉泰年间，兴元府达到了7798匹，成都府为5196匹<sup>⑦</sup>。此消彼长，从乾道至嘉泰，三衙每

① [宋]佚名编，刘笃才点校《吏部条法·奏辟门》记嘉泰三年彭（轸）[恪]札子“照得江上诸军合取川马，系在成都府团併排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〇八，第3327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三十一，第7159页；兵二五之五一，第7225页；兵二五之五：隆兴元年三衙“并令依例各差统领官一员，前去宕昌马场监视买发”，第7202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五一，第7225页；兵二六之一五，第7234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五、三六，第7196页。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四，第3330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二月庚辰，第2577页；[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三衙沿江诸军取马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29页。

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川秦买马岁收茶帛数》，第425页。

年所得马匹,由71纲增长到112纲,而同时期的江上诸军反而从80纲下降到58纲<sup>①</sup>,仅约为三衙所得的半数而已。

当然,上述数字都是南宋朝廷规定的数额,不论是向三衙,还是向江上诸军,四川茶马司所实际排发的马纲数,都会有相当的出入和不能足额的问题。如宋孝宗乾道年间茶马司拖欠的三衙马匹,通常就在“一千匹上下”。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至庆元六年(1200)的四个年度,三衙得马仅分别为93纲、71纲、97纲、96纲,嘉泰元年(1201)则为78纲,嘉泰二年(1202)为64纲<sup>②</sup>,确乎“率未尝如数”<sup>③</sup>。但若再考虑到江上诸军应得马匹被拖欠和不足额的程度,往往要远高于三衙的因素,双方之间的实际差距可能还要大。如隆兴元年前后,江上诸军先后被拖欠马匹达到了93纲,而同时期三衙被拖欠的不过为55纲<sup>④</sup>。乾道元年(1165)五月,鄂州都统制赵樽言“本司合得纲马,茶马司有隆兴二年一全年未曾发到。”嘉泰三年(1203),江州都统司更先后被茶马司“拖下本司战马一百一十六纲,计五千八百疋”<sup>⑤</sup>。四川诸军与江上诸军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前后,兴州都统司吴璘所部应得的马匹,茶马司已经是“绩五年不与”<sup>⑥</sup>。这主要是因为南宋朝廷往往督促、严令茶马司,优先、及时地保障三衙的供应,如乾道三年(1167)宋孝宗专门晋升了都大提举茶马司张松的官职,原因就在于他足额保证了三衙的马匹,故“于松职名上特加升进,以为方来之劝”;绍熙三年(1192)十一月,南宋朝廷下诏茶马司“将殿司绍(兴)[熙]三年分纲马疾速排发,无得留滞,具已排发纲数,申枢密院。”绍熙五年(1194)四月,再度下诏茶马司“将殿前司合得纲马照数排发,毋令稽缓”<sup>⑦</sup>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南宋史家李心传所言:“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边,强壮阔大,可备战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羈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记乾道三年二月大理少卿陈弥作言“四川茶马司每年合起江上诸军马八十纲,并行在殿前、马、步三司马七十一纲,宣抚司二分马七百二十匹,总计一百五十一纲零七百二十匹。”(第7160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川秦买马岁收茶帛数》:“成都府马务,每年排发江上诸军马五十八纲”、“兴元府马务,每年拨发三衙马一百一十二纲”。(第425—426页)【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兴元府马务,每年排(养)[发]三衙马一百一十二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4页。《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亦曰“成都府马务,岁发江上诸军马凡五十八纲,月券钱米二百缗,岁计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岁发三衙马百二十纲,其费称是。”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955页。案:120纲,当系112纲之误。参看杜文玉《宋代马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四,第3330页;兵二六之一七,第7235页。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川秦买马岁收茶帛数》,第426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第7160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二,第7206页;兵二六之一五,第7234页。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六月癸酉,第2844页。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四,第3330页;兵二六之四,第7228页;兵二六之六,第7229页。

縻马，产于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堪行阵。今黎、叙等五州军所产是也。縻马每纲五十匹，其间良驯不过三、五匹，中等十许匹，余皆下下，不可服乘。”<sup>①</sup>兴元府马务所购的秦马，被公认为品质优良的战马，“川、秦马司互市之地，惟西和、阶州，并是西马，比诸州为最上”，特别是宕昌赛马场的地位最为重要，“内陕西只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最为重大”<sup>②</sup>。至于川马，时称“縻马”，其品质难以与秦马相提并论，甚至大部分“不可服乘”，根本就无法充当战马，如乾道四年（1168）八月兵部侍郎陈弥作即言：“黎、叙、南平军等州，每买纲马五十匹，内良细马不过三四匹，中等马不上二十匹，余皆下下，不可服乘，发以充数，则必倒毙。”绍熙三年，池州副都统制率逢原也谈到：川、广马“往往眼生脚狂，虽极力调习，终是廉薄，非道地西马之比”<sup>③</sup>。宋孝宗时曾在成都任职的陆游所作《龙眠画马》诗，形象地描述道：“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入几番皮。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圉人太仆空列位，龙媒汗血来何时？”<sup>④</sup>如此弩马，宋人之所以仍然要大量加以购买，相当程度上是出于“縻马远人”<sup>⑤</sup>以稳定边境局势的政治需要，如宋孝宗曾说：“祖宗时有西北马可用，黎马止是縻马。”<sup>⑥</sup>至于广马，质量更在川马之下。

显而易见，从绍兴年间一开始，“于是岁发川马二百匹进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诸军”，“又以秦马三千五百付三衙”<sup>⑦</sup>，南宋将兴元府马务所购的优质马匹“秦马”绝大部分划拨给三衙，就从源头上，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三衙所得马匹的质量要远胜于江上诸军。宋孝宗朝的枢密使周必大曾有言：“西马惟留二分应付蜀中，余七十一纲，每年尽付三衙。而以川、广马，分给江上诸军，行之以久，盖有深意。”<sup>⑧</sup>

更何况，南宋始终对供应三衙马匹的质量标准，有着尽可能较严格的规范，如绍兴二十九年（1159）枢密院即规定茶马司供应三衙的马匹，必须要符合如下标准：“八岁以下，齿嫩、及格尺、堪披带好马。”乾道五年（1169），令茶马司“收买战马，须四尺四寸以上。其两齿马，听低二寸；四齿马，听低一寸。足齿马，依已降指挥收买。四尺四寸以上、阔壮、堪披带马，计纲排发施行”；淳熙八年（1181）又规定“四尺二寸以上，十岁以下，方许起纲。不合格者，虽骨相骁骏，驰骤超逸者，亦不收买。”绍熙五年（1194），四川茶马司亦言：“照得本司每岁排发三衙纲马，并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川秦买马岁收茶帛数》，第425页。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五，第3331页；[宋]员兴宗撰《九华集》卷七《议国马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四，第7171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三，第7161页；兵二六之四，第7228页。

④ 《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7页。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〇五记茶马司言“内叙州、长宁军，并系縻马远人。”第3326页。

⑥ 《宋史全文》卷二七下《宋孝宗八》，淳熙十五年二月庚辰，第1928页。

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二月庚辰，第2577页。

⑧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七《论马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拣十岁以下，壮嫩、阔实，无病、及格好马排发。”<sup>①</sup>四尺四寸，马高约合1.36米，当时已经算是难得的大马了<sup>②</sup>。

另外，为了保障对三衙马匹的供应，绍兴年间，宕昌寨马场就曾大量拖欠对四川吴玠部的马匹供应，按照吴氏本人在绍兴二十六年的说法“其茶马司自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分应副二分马，共三千六百余匹，未曾支拨”<sup>③</sup>，“绍兴十一年，得旨：令宕昌寨岁所市西马十分之二给本军。而茶马司绩五年不与。今军中有马七千，皆已老大，恐无以备缓急，望茶马司今岁如额支拨，其余逐旋补还”<sup>④</sup>。此后，宋廷还多次拒绝了四川驻军在宕昌马场购买战马的请求，兴元、兴州等都统司另行置场收购，也被严格限定在四月份宕昌马场闭场之后。如此种种，目的皆在于避免形成对三衙优质马源的竞争和分割。淳熙二年（1175）八月，当朝廷拟拨付部分西马给予镇江都统司时，周必大极力反对，他说“今春镇江都统郭棣言川、广马不堪披带，乞拨西马三十纲，有旨与半。茶马司见来申明，势须于三衙马内分拨，万一江、鄂等军继皆有请，则三衙西马愈少，其于岁额，岂容更亏？臣愚欲望圣慈，特留宸虑，裁处其当，实今日之先务，取进止。”<sup>⑤</sup>其理由，也是为了避免影响三衙马源。

广马的分配，同样是将优良马匹优先供应三衙，“广马之良者付三衙，而其他则付建康、镇江府、池、鄂、太平州军中，皆有常数”、“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sup>⑥</sup>。总而言之，在马匹的分配当中，三衙始终居于很明显的优先地位，从宋孝宗朝开始，三衙更愈来愈大幅度地凌驾于江上诸军之上，重三衙、轻江上诸军各都统司，优先保证三衙的需求成为南宋马政的基本原则。

三衙殿前司和马、步军司之间马匹的分配，则是以殿前司为重中之重，优先保证殿前司的马匹供应。乾道六年（1170）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即有言：“窃见本司逐年合得纲马，比之马、步司及江上诸军纲马数多。”<sup>⑦</sup>例如绍兴十九年的分配方案，就是殿前司1500匹，马、步军司各1000匹，殿前司已经享有较明显的强势地位。绍兴二十四年（1154）十二月，南宋又下诏规定：改为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将纲马轮流拨给殿前司和马、步军司，“可自二十五年为始，循环拨付殿前、马、步三司，如二十五年并拨付殿前司，二十六年分拨付马、步军司，二十七年却拨付殿前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五，第7156页；兵二三之一三，第7166页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第1394页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六，第7229页。

②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264页。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〇八，第3327页。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六月癸酉，第2844页。

⑤ 《文忠集》卷一三七《论马政》。

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中盐易马》，第432页 《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56页。《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三：绍兴七年广西进马十四，宋高宗御批“留一匹，余付殿前司”（第7196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八，第7214页。

司。周而复始，皆循此三年为例”<sup>①</sup>。

按照这个分配方案，殿前司所得的马匹，要占三衙纲马总数的三分之二，居于绝对的强势地位；马、步军两司合计起来才占三分之一，仅为殿前司所得的一半，双方差距十分悬殊。因此，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月，在马、步军司联名上书的强烈反对之下，南宋朝廷接受了马、步军司的意见，将分配方案调整为：以二年为一个周期，“殿前司取押一年，马、步军两司分取一年，周而复始”<sup>②</sup>，也就是将殿前司和马、步军两司所得马纲的配额，调整为各占百分之五十。但在隆兴元年七月，朝廷又接受了殿前司资深统帅、时任御营使杨存中的意见，“望将岁额合起西马七十一纲，自隆兴二年为头，令逐司照应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已降指挥，皆循三年为例”<sup>③</sup>，将“以二年为例”重新恢复为以“三年为例”。

直至乾道三年二月，方在主管马军司李舜举、主管步军司陈敏的建议之下，最终确定三衙各司之间马匹的分配方案为“今后茶马司起发西马到行在，不以年份，轮拨付三衙。内殿前二纲，马、步军司各一纲，周而复始。”乾道四年（1168）七月再度下诏重申“令茶马司将三衙西马内殿前司二纲、马、步军司各一纲，轮拨起发，周而复始。”<sup>④</sup>这一方案的主旨，在于不再区别年度，而是将每一年度当中的三衙马纲，都平均地拨付殿前司和马、步军司。如按112纲的三衙纲马年度总数来计算，则殿前司每年可得56纲，马军司和步军司每年各得28纲；若按71纲来计算，马、步军两司合计35纲，各得不过18纲，殿前司则每年得马36纲，殿前司的优势地位仍然是明显的<sup>⑤</sup>。

马军司和步军司之间，则一直遵循着大致平分的原则，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主管马军司公事李显忠即谈到“本司取拨绍兴三十一年分纲马三十六纲。”<sup>⑥</sup>该年度三衙纲马的总数为71纲，则步军司所得为35纲，两司确实基本持平。

## 二 三衙马纲的运送、自取和马驿

南宋四川茶马司拨付三衙的马匹，本来由茶马司负责押运抵至都城临安，赴枢密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七，第7197页。又略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庚辰，第2735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四二，第7199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五，第7202页；兵二五之一〇记乾道元年二月二日权马军司职事李舜举言：“今年分纲马，合当本司取押。”同月十一日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言“本司差人前去兴元府茶马司，取押隆兴二年分马七十一纲。”第7205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五、一六，第7207—7208页；兵二五之一九，第7209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一九记载开禧二年正月右卫郎将、管干殿前司职事郭杲言“本司岁差人于四川茶马司取押马三十六纲。”第7236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四三，第7200页。

院交纳,但随即普遍出现了马匹在运输途中大批倒毙的问题,“自蜀抵吴,道里修阻,马之得全者,十无四五”、“其马多至死损,甚者十之四五”<sup>①</sup>。以乾道九年(1173)茶马司所发殿前司的一纲马纲为例:从兴元府出发时为50匹整,至金州时剩余45匹,至均州、房州后仅余22匹,至襄阳府时更仅剩余16匹,死损率高达近70%!负责押运的兵夫,除曾祺一人之外,其余的“尽行逃走”<sup>②</sup>。即便是勉强运抵临安的马匹,诚如绍兴二十三年(1153)正月诏书所云“茶马司进到纲马,缘押马使臣失于看护,多至疮疥瘦瘠,仅存皮骨,往往喂养不成。”<sup>③</sup>也大量充斥着病马和弱马,随即死亡的现象比比皆是。

问题的症结,确与路途遥远、道路崎岖、兵夫待遇微薄等恶劣的客观条件有着相当的关系,绍兴十六年(1146)四月御史中丞何若有言“四川茶马司逐年起发马数,差人管押赴行在交纳,缘所差牵押兵士别无交替,道路遥远,经步月日,人力既自疲乏,加之在路草料间有不时,其马多至死损。”<sup>④</sup>但正如更多当时臣僚所指出的,真正关键的因素在于:茶马司所派牵马官兵,主要是征调四川各州的厢军充当,而其时的厢军,早已完全丧失了军事职能,“类皆游手”,官兵不仅“往往不识马性,饮喂失时”<sup>⑤</sup>,纪律松散,偷盗马料、倒卖马匹等更是层出不穷,“沿路偷盗草料,便自逃窜”<sup>⑥</sup>,马匹大量人为的损耗自然在所难免。

事实上,由于厢军不敷使用,四川茶马司更多地是出钱雇佣普通民众来牵马,此类问题当然也就更为严重。绍兴二十六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杨偁说“川、广各置马司,所费不貲,而马以纲来者,皆损耗羸瘠之余,诚可深惜。盖牵近送,皆和雇游手充代,往往坐视倒毙,甘心逃窜。”乾道六年兵部侍郎王之奇也说“伏见蜀中马纲之役,四川州郡发牵马兵士,额差四千余人。”<sup>⑦</sup>特别是从宕昌至兴元府,茶马司“和雇人夫牵送,并不用心养喂”,所雇佣的民夫当中,甚至大半充斥着“十四五岁小儿子,止是赶逐马行”<sup>⑧</sup>,遂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马匹白白损失。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南宋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十二月下诏“西和州宕昌县、阶州峰贴硤两处买马场,每岁起发纲马赴枢密院,押纲使臣往往不得其人,喂养失时,多致倒毙。可自二十五年为始,循环拨付殿前、马、步三司……仍令逐司当拨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八,第7209页;职官四三之一〇六,第3326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第7225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七,第7197页。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〇六,第3326页;兵二五之七亦记乾道元年七月臣僚言:四川茶马司“差厢、禁军牵马长行,日支米二(升)〔升〕,铜钱六十文,委是贍给不足,难以责办”。第7203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九,第7169页;职官四三之一〇七,第3327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第7201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八,第7197页;兵二五之二八,第7214页。

⑧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四〇;第7198页;兵二五之五二,第7226页。



马年中，每一纲选差有心力使臣一员，军兵三十人，就买马场团纲起发，赴枢密院交纳。”<sup>①</sup>按照这一诏书的相关规定，三衙应当派遣本部官兵，前往宕昌等买马场直接取马，“逐司自差官兵就买马场团纲起发”。然而，南宋时的宕昌，是一个仅有百余户人家的西陲小镇，“寨屋窄隘，难以屯泊取马官兵”、“窄狭民稀，艰得舍屋安泊”<sup>②</sup>，根本就不具备接待三衙取马官兵的起码条件。因此，南宋又主要听取了茶马司的建议，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颁布了两项补充规定：一是三衙官兵改至兴元府取马，“就兴元府马务团纲起发”，从兴元府至临安的运输由三衙负责，称为“长押”。二是从宕昌寨至兴元府之间的路程，仍由茶马司负责运送，称为“短送”。

对此，三衙似始终持有异议。乾道九年、绍熙元年（1190），三衙都曾经提出过反对的意见，尤其是在绍熙元年十二月，殿前司和步军司联合上书枢密院，历数茶马司“短送”之弊，建议干脆取消“短送”，“宕昌买马，本司自差使臣、兵夫短送至兴元秦司。其三衙人就兴元秦司领马，长押归司。缘茶马司短差纲官，止是寄居待阙使臣；其短送人，诸州所差军兵不足，多是雇夫牵送，皆乌合游手。自宕昌雇夫应数，冒请雇钱，出门之后放散，却与兴元近地借人应数，赴秦司纳马，沿路偷盗草料。自宕昌至兴元，二十驿程，养饲失节，因而受病，到务相继倒损，弊害非一。欲令三衙官兵径赴宕昌取马，将雇费量与添助劳食”<sup>③</sup>。但经过再三斟酌，特别考虑到宕昌寨属于邻近西夏和金朝的“极边”，“虑恐积留官兵，在彼歇程，因而与西夏、卖马蕃客博易物货，引惹未便”，南宋最终出台的解决方案是：三衙大部取马官兵仍在兴元府等候，仅抽调其中的八名官兵前往宕昌，“先次识认本纲马毛色、齿岁、尺寸”，然后与茶马司兵夫共同将马匹押至兴元府，沿途负责“提督饮喂”<sup>④</sup>。显而易见，这仍然属于一个折衷性的方案。

南宋改由三衙至兴元府自行取马，在解决马匹在运送途中大量死亡的问题上，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隆兴元年三月，四川茶马司就报告说：自三衙、江上诸军“自差使臣、军兵前来取押，往往全纲到军”。乾道二年（1166），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也谈到：三衙“差拨官兵，起兴元府茶马司团纲交割归司，往往稍及臃分，少有损弊之数”<sup>⑤</sup>。但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一些新的问题随即出现。早在绍兴、隆兴之际，已经有臣僚发现：三衙“取押西马，所差官兵，职资高大，费耗批请；又取马官兵，二年一次，往来道途，弃习武艺”，进而提议：依旧令茶马司“差使臣、军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七，第7197页。《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四年，始拨秦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第1394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四〇，第7198页；兵二三之二一，第7170页。

③ 《宋会要辑稿》二三之二一，第7170页。

④ 《宋会要辑稿》二三之二一，第7170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第7200页；兵二五之七，第7203页。

兵管押”<sup>①</sup>。

具体说来,其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三衙大批官兵奔走道路,据南宋史家李心传的统计:三衙取马“再岁一往返,用精甲四千四百人”<sup>②</sup>,约占三衙总兵力的4%左右。显然,如此规模的兵力用来押运马匹,平时妨碍军事训练,战时则使相当数量的精锐兵力置于无用之地。二是三衙和茶马司之间协调困难,导致或是取马官兵拥挤在兴元府等候多日,“官兵只在兴元府守候纲马,坐费券食”<sup>③</sup>;或是马纲齐备,但取马官兵却未能及时到达,一位信阳军的守臣就概括说“秦司排拨纲马,兵士已至而马数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券为忧;马数已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复以多费草料为念。”<sup>④</sup>枢密院也曾谈到“各军差拨使臣、军兵前去取押,或有马多而人未至,或人到而马未有。留马待人,则茶司有刍秣之费;留人待马,则州郡有券食之(颂)[颁]。”<sup>⑤</sup>如此以来,都难免造成了取马费用的大幅度上升,“虚费钱粮”的现象颇为严重,特别是加大了茶马司的负担。三是三衙取马官兵所享受的待遇要远远超过茶马司所征调的地方厢军,不仅耗费军饷,所经州县也难免“颇惮其费”。正因为如此,在绍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诏书颁布以后,三衙取马的相关政策的较大变动,依然是多次出现。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下攻宋,三衙各军多在前线迎战,南宋下令仍由四川茶马司征调厢军和雇佣民夫,将马匹全程运抵临安,三衙仅象征性地派遣一名兽医前往跟随。此举显然属于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性安排。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待宋金战事基本稳定之后,南宋再度下诏,令茶马司“将岁额川、陕纲马,差人管押至汉阳军,置驿歇泊,仍令三衙及江上诸军差人前去就汉阳军取押”<sup>⑥</sup>,将其调整为:兴元府至汉阳军段,由四川茶马司负责;汉阳军至临安,则仍由三衙派本部官兵负责取马。乾道四年,南宋在汉阳军设立了“收发马监”,次年四月兵部随即规定:“茶马司差使臣,自成都府及兴元府押马至汉阳军马监。”<sup>⑦</sup>三衙和茶马司在汉阳军马监交接。

不过,这一规定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三衙的反对和抵制。乾道元年(1165),殿前司和马、步军司都坚持派遣本部官兵,前往兴元府接收马匹,所持的理由,仍然是茶马司运马导致马匹的大量死亡,如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即奏请“茶马差厢兵、雇夫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之二,第7200—7201页。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三衙沿江诸军取马数》,第429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庚辰,第2735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五,第7207页。

④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第1394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一,第7237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五,第7202页。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二、一一三,第3329—3330页。

等送至行在，马沿路倒毙过多，不堪医疗，利害灼然”、“欲乞权依绍兴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指挥，本司差统领官一员前去监视买发，继续差拨人兵，就茶马司团纲处交割，管押归司。所贵纲马到司，易于养饲，便得为用。”权马军司职事李舜举也上奏“今年分纲马，合当本司取押，检照得绍兴三十一年指挥，系茶马司差人牵拽前来，人夫不切用心，是致倒毙。所有今年合得纲马，乞令本司自行差拨惯熟能养马官兵，前去兴元府取押，贵得不坏官马。”<sup>①</sup>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倒毙过多”与“虚费钱粮”相比，两者的分量孰轻孰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乾道九年，枢密院也赞同了三衙此前的意见，认为“四川茶马司近来拨发纲马到监，比之每岁，寄毙数多。窃虑所差使臣，不行精选，在路不切用心养喂。”于是，又有了乾道九年三月份诏书的颁布，废止了茶马司将马匹运抵汉阳军，改令“三衙并江上诸军将见差取马使臣、军兵，今后径往茶马司取押”<sup>②</sup>。六月份，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友直根据“得旨：纲马依旧差人前去四川茶马司取押”<sup>③</sup>这一圣旨的精神，专门上书拟定了具体的取马各项细则，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然而，这一诏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似乎曾经有所反复，因为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的时候，殿前司在上奏中仍然说“茶司牵马官兵，系诸州抽摘厢宜，类皆游手；押纲使臣，初非遴选，不谙马（姓）[性]。纲马多毙，其实由此。乞只从三司选差官兵，前去取押。”<sup>④</sup>至此，三衙派遣本部官兵前往兴元府取马，才最终成为了南宋的定制。

南宋茶马司排发马匹，以纲为单位，通常是50匹马为一纲。三衙取马，也是以纲为单位，每纲派遣一个取马分队，如乾道八年（1172）马军司“成忠郎曲用取押本司第三纲战马”、嘉泰二年（1202）殿前司“差李举管押嘉泰二年分岁额第三十一纲马，计五十疋”、步军司“差张旺管押嘉泰二年分岁额第十三纲马”<sup>⑤</sup>等等。三衙取马分队，除了乾道初年以茶马司实际送到汉阳军的马匹数目，来具体确定三衙取马分队的人数之外，通常是由官兵32名组成，“纲官一员”、“纲兵三十一人”。以乾道九年为例，其人员组成情况就是：纲官一员，小管押一名，兽医、军典、先牌各一名，火头两名，牵马士兵25名，每名士兵负责牵马两匹<sup>⑥</sup>。

取马纲官和纲兵，都由三衙自行抽调本部官兵组成，但要遵守朝廷的若干规范：纲官，通常由下级军官小“使臣”充任，嘉定二年（1209）还专门下诏规定“三衙、江上诸军自今应押马纲官，并差承信郎已上人，不得差校、副尉。”<sup>⑦</sup>此项规定，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七，第7203页；兵二五之一一，第7205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四一；兵二五之四〇、四一，第7220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五一，第7225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九、二〇，第7169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二，第7216页；兵二六之一二、一三，第7232—7233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一九，第7236页；兵二五之五一，第7225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〇，第7236页。

目的在于使纲官责权统一，因为校尉、副尉等军校虽然也在小“使臣”的范围之内，但皆是其中最低级的、不入流的武官杂阶，根本没有品级、“不系磨勘”，大多也没有实职，即使取马不力显然也“无官可降”、“无资可降”，而承信郎则是从九品武官<sup>①</sup>，情况较校尉等就会大有不同。另外，乾道七年（1171）八月，宋孝宗还曾特别规定“专差训练官一员充纲官。”次年八月份，就有“马军司取马训练官张立”<sup>②</sup>。其目的，正如宋孝宗本人所言：“部押使臣，亦须差训练官以上，庶几军校有所畏惮，则沿路不敢怠于刍秣矣。”<sup>③</sup>因为南宋三衙的训练官属于中下级军官，通常以正八品到正七品的大“使臣”且武艺高强者担任<sup>④</sup>，其官阶和地位远较小使臣为高。不过，从《宋会要辑稿》当中所录三衙取马纲官的官衔情况来看，确乎以从承信郎到从义郎的小“使臣”为主，宋孝宗以训练官充作纲官的规定似乎并未长期地执行下去。

至于纲兵，相关的朝廷诏令，一是强调只从三衙普通士兵当中选派，以便降低取马成本，乾道五年诏书即明确规定“三衙并江上诸军、广西经略司取押纲马军兵，今后并不许差十将以上人。”<sup>⑤</sup>二是要求三衙须优先遴选骑兵，乾道元年的时候已经命令三衙，“每纲差使臣一员充管押外，余差关马効用前去取押”<sup>⑥</sup>；乾道七年（1171）更专门下圣旨“令三衙、江上诸军今后差拨阙马官兵，前去马监牵取本名下马归军。”此事的动议，主要出自于宰相虞允文，他曾在廷议当中对宋孝宗表示“臣昨与舜举言，今后取马，不如差阙马官兵自往，马既着脚，自然护惜，不致损毙。舜举亦以为然。”<sup>⑦</sup>舜举，即李舜举，时任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需要说明的是，三衙在实际执行当中，并未能严格地贯彻这一规定，步军司是从一开始就以本司骑兵数量有限为理由，申请“于步军、弓箭手内拣摘能骑马射弓之人，逐旋拨填”<sup>⑧</sup>，并得到了批准。殿前司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开禧二年（1206）管干殿前司职事郭杲曾经建议：“纲兵三十一人，悉以步军正带甲人为之。自临安至兴元，往返万里，经涉山险，若得谙晓马性之人，在路牵取养喂，庶几不致瘦毙。今步军不惟有妨教阅，堕武艺，又且谙晓马性。今相度自后所差取马官兵，内纲官从旧选差使臣，余牵马军兵等，除兽医一名外，并于诸军阙马効用及雄効内差拨，必肯在路留心养喂。”<sup>⑨</sup>郭氏此奏可以说明：开禧二年前殿前司取马纲兵，同样是步、骑兼用，以步兵为主，甚至是全部使用

①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三，第7216页；兵二五之三九，第7219页。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六，第3331页。

④ 《宋代官制辞典》，第477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二，第7211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一，第7205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三，第7216页；职官四三之一一六，第3331页。

⑧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八，第7219页。

⑨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一九，第7236页。

步兵。

三衙取马，始终是走陆路，取马官兵的食宿和马匹的草料供应，都要依赖沿途州县所设立的马驿来保障，“三衙每年取押纲马，全藉马驿，办其草料，以时养饲”<sup>①</sup>。从宕昌寨至临安，大致是按50里左右的间隔设一马驿，总计设有马驿100所，即自宕昌至兴州15驿，自大桃至汉阴15驿，自衡口至干平13驿，自梅溪至石墙14驿，自应城至石田14驿，自边城至杨梅11驿，自紫岩至广德军12驿，自段村至临安府余杭门6驿。其中，三衙取马所经的兴元府至临安段道路，按当时宋人的计算为4889里<sup>②</sup>，共设有马驿85所。马驿的物资供应和相关事务，皆由所在县的县令和县尉负责<sup>③</sup>，路、州地方长官例系“提辖马纲程驿”衔，负责监督。至淳熙十六年（1189），南宋采纳了殿前司和步军司的建议，又命令三衙纲马途经的兴州、兴元府、金州、江陵、鄂州、江州、池州等七个都统司，也都要各自选派一员将官，协助地方管理马驿，“逐司量给盘费，与诸州军所委官同共提点”、“点检驿舍草料”<sup>④</sup>。段村至临安府余杭门段的6个马驿，其具体地由殿前司和步军司派员负责。每所马驿，各县通常要配备兵夫五名，并预先准备好“拣净稻子、大麦及齐头整草”等诸多物资，“各就马驿附近椿顿，纲马到日，随即支給”，供给三衙取马分队使用<sup>⑤</sup>。如乾道八年（1172），江夏知县唐楠即上言“有马军司取马训练官张立等，押马到本县驿批支粮料。”<sup>⑥</sup>为了保证马匹的草料供应，绍熙四年（1193）宋廷接受了殿前司护圣马军统制刘世荣的奏请，又下诏补充规定“令三衙、江上诸军，今后取马官兵，每纲各先给十日草料价钱，将带前去，准备（过）〔遇〕住程阙少去处，接续收买草料，如法养喂。或有支用钱物不尽，回纳本军。”<sup>⑦</sup>

三衙一行取马官兵，除了正常的军俸之外，还凭借随身携带的“口券”，按日从途经州县领取钱粮补助，嘉定九年（1216）臣僚即言“国家市川、广之马，以备战

①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第1395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四，第7212页；兵二六之一九，第7236页。案《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三四记载：乾道六年宋廷曾下诏“令三衙行下取马官并关牒沿路州军，取径路前去建康府。”第7141页。但此令应为临时性的个别举措，三衙取马的终点仍当为临安。又，马军司乾道七年移屯建康之后，其纲马“权前行在马军旧司收管。侯承旨司火印讫，养喂一月，差官兵牵（泄）〔拽〕至本司交管”，嘉定六年后改由“步军司差拨诸晓马政将官一员，部押前来交管”。见《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一，第7237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六“盖州县马纲草料、批请、程驿多是委之县令、簿尉。”第7208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〇，第7169页。又见《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第1395页，但《文献通考》漏掉了江陵副都统司。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〇，第7210页。《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第1395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九，第7219页。又，兵二五之三二、三三：乾道七年六月“诏宁国府南陵知县赵傅庆降两官、放罢，当行人吏各从杖一百、勒罢。以傅庆违旨，不预办马驿钱米草料”。第7216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五，第7229页。

阵, 所过郡县, 批支草料、钱粮。”<sup>①</sup>供给的数额, 大致是参照出征将士的标准, 较为优待, “将校日给米一(胜) [升] 半, 铜钱一百五十文省; 军兵日支米二(胜) [升] 半, 铜钱七十文省。至铁钱地分, 纽计支給”。淳熙十六年(1189), 南宋又专门下达规定 “今后诸军取马官兵, 遇有疾患, 仰纲官申所至州县, 分擘生券, 挨日批支。令本处命医调治, 差人看护, 候痊可给口券, 转牒郡邑, 津遣还军。”<sup>②</sup>途中生病的官兵, 有权得到地方官府的及时医治和救助。这些费用, 由于主要是由沿途的地方官府承担, 难免要加重地方官府的财政负担。所以, 南宋时三衙马纲 “沿道数十州, 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 其数不貲”、“上则耗国用, 下则困州县。纲兵所经, 甚于寇贼”、“州县颇惮其费”<sup>③</sup>等一类的说法颇为流行。

三衙取马出发的时间, 本来没有严格的规定, 嘉定七年(1214) 才定为七月以后方可出发<sup>④</sup>。马纲抵达临安之后, 则要依据专门的 “赏罚格” 细则, 对三衙取马官兵进行严格的考核。牵马纲兵, 按每人牵马两匹计算, 分为四等: 1. 两匹全到, 且体格健壮的, 晋升一级官阶 “转一资”, 不愿转资折钱 30 贯; 2. 两匹全到, 但一匹病弱, 赏钱 15 贯, 或 “转半资”; 3. 两匹病弱, 或一匹倒毙, 不予赏罚; 4. 两匹倒毙, 降一资, 无资可降者杖 80。纲官, 则以本纲马匹沿途倒毙的数量为最主要的指标, 来决定升降官阶和增减磨勘年限, 即提前还是推后获得提升, 具体规定为: 1. 全纲到达, 晋升两级官阶; 2. 倒毙五匹, 晋升一级官阶, 五匹以下, 除晋升一级官阶之外, 又依次各多减一年磨勘年限, 至倒毙一匹, 即减磨勘四年; 3. 倒毙六至九匹, 不晋升官阶, 只依次减四至一年磨勘年限; 4. 倒毙 10 匹, 不予赏罚, 倒毙 11—14 匹, 各增加一至四年磨勘; 5. 倒毙 15 匹, 降一级官阶, 倒毙 16—19 匹, 除降一级官阶外, 各增加一至四年磨勘; 6. 倒毙 20 匹, 降两级官阶, 倒毙 20 匹以上, 每 5 匹再降一级官阶。医兽等人的赏罚, 基本上比照纲官, 但不包括增减磨勘年限, 仅升降官阶, 无资可降者则要杖 100。<sup>⑤</sup> 总之, 南宋马纲 “赏罚格” 以赏为主、赏重于罚的特点十分明显, “盖取马类有赏”、“大抵押马乃武臣军校速化之途, 而副尉累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二, 第 7237 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 第 7201 页; 兵二六之一, 第 7227 页。

③ [宋] 洪迈撰, 孔凡礼点校 《容斋随笔·续笔》卷五《买马牧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年, 第 276 页 《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 第 4957 页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三衙沿江诸军取马数》, 第 429 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一: 嘉定七年十月七日诏 “令茶马司今后(名) [每] 发三衙、江上诸军纲马, 仰自正月以后, 预期排定纲数, 申枢密院行下各军。自七月以后, 方得起发, 前去取马”。第 7237 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四一、四二、四四, 第 7220—7222 页 《吏部条法·磨勘门》: “诸内外诸军, 岁终比较所养战马倒毙, 该展磨勘人虽遇大礼赦, 不在免展之限。取押纲马使臣、干办纲马驿程官倒毙该展磨勘人准此。” 第 358 页。

以赏转至正使者，不可胜数”<sup>①</sup>，故当时的三衙官兵也普遍地将马纲视作难得的美差。

### 三 马院与三衙战马的牧放

三衙马纲运抵临安之后，必须首先经过枢密院承旨司的审验，合格的马匹由承旨司加以“火印”，即分别打上“甲”（殿前司）、“乙”（马军司）和“丙”（步军司）的烙印，并登记造册，然后方能拨付三衙使用。病弱、矮小无法充当战马的马匹，则予以淘汰。负责审验的两名兽医，原本皆由枢密院承旨司从省马院指定，但为了避免“预先计囑之弊”，乾道八年后改为由三衙轮流选派本部的兽医充当，“临时依公看喝”<sup>②</sup>。纲马被枢密院承旨司“火印”之后，在宋人眼里就等同于士兵的刺字，意味着参军入伍。当老、病马匹从三衙退役的时候，同样要由承旨司烙上“出”字。

引人注目的是，南宋朝廷一直比较关注三衙退役战马的命运，绍兴十八年（1148）当马、步军司申请“将不堪乘骑马下临安府卖”的时候，宋高宗就训令说：“若卖与市人，不免屠剥，诚所不忍。其尚堪乘骑者，可发赴省马院。”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更专门下令三衙及江上诸军各置马院一所，“专收养拣退老病马，于元破草料内减半支給。责队外人看喂，令医兽常切医治，仍差将官一员提督，不许擅行宰杀。有倒毙，方得出卖。仍月具见管数目，申枢密院”<sup>③</sup>。此外，乾道七年至九年，除了职司医治病弱马匹的医兽之外，三衙还曾设立了专门的医马院，集中收治患病和老弱的马匹<sup>④</sup>。宋朝“以仁立国”、“以忠厚立国”，始终为宋人所津津乐道，当代学者也指出：政治、社会运作趋向于文明化和理性化，是宋代历史的突出特点和亮点<sup>⑤</sup>。马院和医马院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视作宋朝“以仁立国”的一个具体体现。

为了保持和提升军马的战斗力的，南宋三衙的战马实行定期集中牧放。每年从四月至九月，除将少量执行战备执勤的马匹和病马留在临安以外，大部战马都要至外地的专门牧场就水草放牧，十月份方返回临安。庆元五年（1199），南宋朝廷又接受臣僚建议，专门下诏督促三衙殿、步二司“自今呈马之际，除十分病（发）[废]，不任医治，别作行遣区处外，应见管马无问肥瘦，并从牧放。如合量留在寨，亦须壮实可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六，第3331页；[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五《财计门·马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2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七，第7218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六，第7196页；兵二六之一，第7227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三、二四，第7211—7212页。

⑤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用,以备缓急。不许专养肥马,以为冒赏之地。”<sup>①</sup>

殿前司的牧马场,南宋初年时设在常州的宜兴县,史能之《咸淳毗陵志》记载:牧马“寨旧有二:一在宜兴县法藏寺前,一在潼渚村。中兴后为殿司牧放之所。乾道间,徙苏、湖等郡”<sup>②</sup>。宜兴县因此就“以牧马券料为负,自南狩则然,常预用二年后税”<sup>③</sup>。从绍兴十八年前后开始至乾道初<sup>④</sup>,殿前司牧马的大本营由常州移往平江府(苏州),范成大《吴郡志》有云“牧马寨,大寨八,小寨十七,散在城内。每岁四月,差统兵官总辖牧放,九月回。总辖衙在定慧寺西。”<sup>⑤</sup>

具体牧场,一是平江府吴江县的合路村,称为合路马坊。陆游《入蜀记》:乾道六年六月八日,“过合路,居人繁夥,卖鲊者尤众。道旁多军中牧马”<sup>⑥</sup>。绍熙元年(1190)正月,杨万里撰有《合路马坊,年年四月殿前诸军牧马于此,十月复归都下》诗,其诗曰“地迥湖宽春草酥,年年此地牧天驹。玉花骢里龙归去,金粟堆前鸟自呼。苑厩尚虚三万柱,柳林集得许多乌。即今未有王良眼,山子飞黄岂是无?”<sup>⑦</sup>洪迈《夷坚志·夷坚支甲》卷三《吕使君宅》则曰“淳熙初,殿前司牧马于吴郡平望,归途次临平。”<sup>⑧</sup>平望紧邻合路,同属吴江县,故洪迈有此说。二是秀州(嘉兴府)。殿前司护圣军于此牧放,如乾道七年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即曰“乞将护圣军马尽发遣前去秀州本军牧放。”<sup>⑨</sup>另外,绍兴三十年,殿前司还曾于宣州牧马<sup>⑩</sup>,但这很可能仅是临时性的辅助安排。

马军司的牧场本来在湖州,乾道二年马军司曾“申差人前去严州收买木植二万条,添置湖州牧放寨屋”<sup>⑪</sup>。然乾道九年马军司上奏说“本司诸军官马,未起发往建康府日,逐年于姑城牧放。”<sup>⑫</sup>姑城,即平江府(苏州)。这说明在乾道七年(1171)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一一,第7232页。

② [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卷一二《牧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第3058页。

③ 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三《福建运使直显谟阁少卿赵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47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六:绍兴十八年杨存中奏言“乞于平江府添盖牧马屋。”第7196页。

⑤ [宋]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五《营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⑥ 《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四三《入蜀记》,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409页。

⑦ 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2页。

⑧ [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夷坚支甲》卷三《吕使君宅》,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29页。

⑨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二,第7216页。又,兵六之一七、一八:绍兴二十八年殿前司营建牧马寨,“平江府合用寨屋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四间,并秀州护圣军添盖二百间”。第6863页。可见,殿前司护圣军战马于秀州牧放,其他则在平江府。《容斋续笔》卷五《买马牧马》:“又三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第276页。案:此处所说的三衙,其实主要指殿前司。

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正月癸卯,第3074页。

⑪ 《宋会要辑稿》兵六之一九,第6864页。

⑫ 《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三三,第7142页。



马军司移往建康之前，其牧场已由湖州移至平江府。又，《宋史·虞允文传》曰：“侍卫马军司牧地旧在临安。”按马军司乾道九年上奏“望下两浙转运，将元本司西溪所置草地尽数拨还”，则马军司临安牧地，或即指临安郊外的西溪。

步军司的牧马场，本来在湖州的德清县，淳熙三年（1176）后移往湖州城郊的下菰城，《吴兴备志》曰：“牧马寨，在德清县西九里，宋牧马于此。淳熙间，移于下菰城。”<sup>①</sup>《宋史全文》卷二六上：淳熙三年五月癸亥“王淮进呈步军司相度牧马去处”，当指此事。宋宁宗时知湖州王炎亦曰：“照对本州管下有下菰城，系每年步司牧放之地。”<sup>②</sup>下菰城，即湖州乌程，叶廷珪《海录碎事》曰：“乌程县，乃古菰城，楚以封春申君，今俗呼下菰城，而旧经谓之五菰城。”<sup>③</sup>在下菰城之外，步军司在临安郊外的西溪也置有牧马场，起辅助作用，如淳熙十六年（1189）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梁师雄即言：“本司诸军递年将肥壮马差往湖州下菰城牧放，其新纲、病瘠、驼负等马往西溪牧养。”嘉定十四年（1221）步军司亦有言：“本司今岁差发下菰、西溪牧放人马。”<sup>④</sup>又，按照乾道九年马军司的说法，马军司移往建康之后，其原在平江府的牧马场就“今来步军司指占，牧放纲马”<sup>⑤</sup>，改为步军司的牧马场。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平江府的合路，还是湖州的下菰城，浙西地区的三衙牧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气候潮湿和草质不佳等问题。隆兴元年，都督江淮军马张浚即建议将殿前司和步军司的牧场移往长江以北的扬州<sup>⑥</sup>；乾道六年，在虞允文的主持下，三衙牧场遂正式北移，殿前司在建康和扬州，马军司在镇江及和州，步军司在六合和真州，大本营则设在了建康府<sup>⑦</sup>。此前的乾道五年二月，宋廷已经诏令殿前司和马、步军司“各差统制一员，前去建康府同江东帅漕，于本府近便宽闲去处，踏逐牧放马五千匹并牧马官兵寨屋地段，措置修盖”<sup>⑧</sup>。众所周知，张浚和虞允文，都是北伐中原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将三衙牧场由江南的平江府和湖州移往江北，在解决水

① [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一四《建置征第十》。[清]乾隆《浙江通志》卷四二《古迹·宋牧马寨》：“宋牧马寨，《德清县志》在县西。南宋殿前司马军每岁放马数千牧于此，洗马滩尚存其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处的殿前司，或系步军司之误。

② [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三《申省论马料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叶廷珪撰，李之亮点校《海录碎事》卷四上《州县门·菰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0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一，第7227页；兵二〇之四三，第7123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三三，第7142页。

⑥ 陈智超整理《宋会要辑稿补编》记隆兴元年五月张浚言“殿前、步军司诸军战马，见在湖、秀州等处牧养，缘淮甸水草利便，望并发遣前来，就扬州牧放。”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第418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三四，第7141页。

⑧ [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468页。

草问题的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显然在于“缓急用骑过江便”<sup>①</sup>,具有强烈的北伐意味。也正因为如此,当淳熙元年(1174)虞允文病逝,宋孝宗最终放弃北伐的努力之后,除马军司之外,殿前司和步军司的牧场再度向平江府和湖州、秀州南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sup>②</sup>。

上述三衙牧场,都建有专供牧马官兵居住使用的牧马寨,乾道六年建康府的三衙牧马寨屋就有12000余间,殿前司在平江府的牧马寨,更经过了十余年的经营,房屋高达13394间之多<sup>③</sup>。牧马期间,所在的州县要承担三衙战马的马料刍粟供应,如绍兴三十年户部即言“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一岁约用米并折纳马料共三万石,系于本州科拨。”<sup>④</sup>又如,三衙“春夏牧马夏菰城,仰给苏、湖、秀三州。适积水冒田,有司预请倍输夏麦,以补刍粟”<sup>⑤</sup>。以湖州为例,其负担的标准为“四月马一匹日支料谷一斗,自五月至八月马一匹日支料谷七升,九月回程马一匹日支料谷一斗”。开禧三年(1207),湖州“共支马料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九斗”;嘉定元年(1208),“共支马料五千九十五石一斗三升”<sup>⑥</sup>。很显然,对地方财政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往往被地方官视作“逐处之患”。

三衙牧马,通常由三衙管军指派各军的统领官率队前往,或以统制一员为总辖官<sup>⑦</sup>。宋孝宗为了表示对三衙马政的重视,往往亲自干预牧马官的选任,如乾道八年殿前司奏拟“令董世英等总辖军兵于扬州牧马”,宋孝宗即指示说“向来闻董世英及张唐臣使酒,朕尝戒之,张唐臣已遵约束悛改,朕以二金碗赐之。董世英闻尚未悛,岂宜差去?可别差人,仍令本军戒谕。”淳熙三年(1176),他又当面训令三衙牧马官说“爱护马当如爱护己身,饥饱劳佚,各随时调节。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马亦不能堪之,但马不能言,告诉不得耳。”<sup>⑧</sup>牧马结束之后,主要根据马匹倒毙数量的多少,对牧马官进行赏罚,如殿前司神勇军统制训武郎刘肇、步军司左军统制修武郎姚旦,“总辖牧放倒毙数少”,宋廷遂下诏曰:“敕具官某等:岁分遣诸军,牧于淞

① 《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第11798页。

② [宋]佚名编《翰苑新书》前集卷三二《三衙》曾引《言行录》曰“郭观察棣,字子华,淳熙五年擢殿前副都指挥使,居殿岩十年。尝为上言:骑兵驻辇毂下,固以重内,然江上有警,奔涉至劳,未及对敌,劲气已挫,愿才留所当用者,余悉牧之丹阳,于计为便。”可知淳熙年间殿帅郭棣亦曾建议,将三衙军马牧场北移镇江府的丹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会要辑稿》兵六之一七,第6863页;兵六之二一,第6865页。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正月癸卯,第3074页。

⑤ 《文忠集》卷七〇《同知枢密院事赠太师洪文安公遵神道碑》。

⑥ 《双溪类稿》卷二三《申省论马料札子》。

⑦ [宋]楼钥《攻媿集》卷四〇有《武功大夫、殿前司选锋军统制李浩总辖牧放合转一官,久任有劳转行遥郡刺史》:“敕具官某:兵久不用,军中累年劳以进武爵,率有止法,无得逾焉。以尔久任戎务,举军推其能,出视驂牧,善修马政。宠以郡刺史之职,盖异恩也。其奋事功,以图报称。”《四部丛刊》本。

⑧ 《宋史全文》卷二五下《宋孝宗四》,乾道八年三月庚寅,第1752页;卷二六上《宋孝宗五》,淳熙三年五月癸亥,第1793页。

右宽闲之乡，惟统御有方，刍秣以时，归而阅实，生全者众，进之一秩，以为来者之劝。”<sup>①</sup>遂得各晋升一级官阶。反面的事例，如乾道六年枢密院有言：“乾道五年分步军司诸军牧放战马数，内中军统领官苗茂、亲随将第一将副将王明、左军统领官孟俊、第三将张国珍下，各倒毙马分数最多，理宜惩戒。”于是，苗茂、马俊被各特降一官，王明、张国珍被各特降两官<sup>②</sup>。

#### 四 取得的成效与问题

南宋三衙马政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三衙拥有战马的数量，得以迅速增加。在绍兴七年（1137）的时候，张俊、岳飞和韩世忠三支大军的战马大多达到了万匹上下，而三衙却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如宋高宗就曾谈到：殿前司“杨沂中马少”。乾道元年七月，宋孝宗还对三衙“惟是马尚少”表示忧虑<sup>③</sup>。但随着马政的展开，乾道七年时，殿前司全军业已拥有战马共计4800余匹，其所辖神勇一军的战马就有995匹；至嘉泰四年（1204），殿前司下辖的战马更增长到以10700匹为编制定额<sup>④</sup>。也就是说，在33年的时间里，殿前司战马的数量猛增了两倍有余，已经足以凌驾于任何一个都统司之上。像著名的建康都统司，其战马定额就是5087匹，大约仅为殿前司的一半上下。

马军司的战马数。据《景定建康志》记载：乾道七年，马军司各军的战马：选锋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各为800匹，前军为600匹，合计为4600匹<sup>⑤</sup>。这应该仅是马军司战斗部队战马的数量，若再加上该司帅衙机关以及留守临安的龙卫、云骑和武骑“三指挥，额管一千人”，马匹的数量应当还要多一些。又，宋孝宗时马军司曾要求朝廷一次下拨牛皮五千余张，以制作马甲，供马军司使用<sup>⑥</sup>。可见，马军司其时的战马，至少应当在五千余匹上下。

步军司的战马数。宋孝宗乾道七年，步军司战马数为2700余匹，《宋史》卷一九三《兵七·召募之制》曰：“乾道七年，马军司王友直言：‘见管战马二千七百余，止有僸马六百余人，请召僸兵千五百，并充雄威。’诏招千人，刺‘步僸’二字。”<sup>⑦</sup>案“马军司王友直言”，大误。查《景定建康志》及《宋史》王友直本传，乾道七

① 《攻媿集》卷三四《殿前司神勇军统制训武郎刘肇步军司左统制修武郎姚旦总辖牧放倒毙数少各转一官》。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二、二三，第7211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三，第7196页；兵二九之一六，第7300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三四，第7141页；兵二五之三二，第7216页；兵二三之二六，第7172页。

⑤ [宋]马光祖纂，周应合修《景定建康志》卷三九《侍卫马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970—1971页。

⑥ 《文忠集》卷六八《丞相洪文惠公适神道碑》。

⑦ 《宋史》卷一九三《兵七·召募之制》，第4820页。

年主管马军司公事为名将李显忠，王氏从未出任过主管马军司公事，他在乾道四年至乾道七年，实任主管步军司公事。从所招刺廉兵刺“步廉”两字来看，“马军司王友直言”当是“步军司王友直言”无疑，他所谈到本司“见管战马二千七百余”，也肯定是指步军司的情况。

宋孝宗乾道以后，步军司战马数量有了较明显的增多，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仅在湖州下菰城一地放牧的马匹就有2565匹，总数自然还要高于这一数字。根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步军司共设9个马军营寨，即：前军马军一寨、右军马军二寨、中军马军四寨、左军马军一寨、后军马军一寨；殿前司则设有19个马军寨。若按照殿前司战马总数为10700匹来推算，平均每个马军寨约有战马500匹强。那么，步军司马军九寨的战马总数，就应在4500匹以上<sup>①</sup>。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行在诸军马草，每年计三百六十万束。”<sup>②</sup>360万束，即36000万余斤。按《宋会要辑稿》所记每匹战马每天消耗草料约13斤来计算<sup>③</sup>，扣除4—9月份半年时间在外地放牧，每匹马年消耗草料为2400余斤，每年度36000万斤马草，可供应的军马数约为15000匹左右。减去殿前司的10700匹，步军司的战马就在4500匹上下，因为其时马军司已经由临安移驻建康。上述推算，虽然可能会有些许出入，但应该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步军司4500匹这一数字，大致与马军司相当，与两司一直大致平分马纲的情况是符合的。当然，即便是以步军司2700余匹、2565匹战马来计算，殿前司和马、步军司三衙战马总数合计，也基本接近二万余匹。

战马数量的扩充，意味着三衙骑兵实力的突飞猛进，当然也就意味着三衙整体战斗力的提升。如若再考虑到三衙新增的马匹，绝大部分来自于西北的优质军马“秦马”、“西马”，其促进意义当更为显著。三衙军力的增强，不论是对外抵御金、蒙古等外敌威胁，还是对内驾驭江上诸军，强化中央集权，皆发挥了相当的历史作用。

对外，以宋金之间几次大的战事为例：绍兴三十一年抵御金完颜南侵之役，侍卫马军司的数万骑步精锐，先是驰援上游重镇鄂州，又东下建康、镇江，俨然被南宋视若干城。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樽更是率本部在蔡州与金兵数度争夺，表现出了较强悍的战斗能力。在著名的采石一战当中，殿前司护圣马军统制王琪所部骑兵，则是虞允文麾下的骨干力量。

张浚主持的隆兴北伐，不论是围攻宿州、进取中原，还是“屯戍两淮”、抵御金兵的反击，宋军都是以三衙各部作为主力。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宋廷即令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张守忠“将带精锐官兵五千人”、“统辖三司人马，听江淮东西

① [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一四《行在所录·禁卫兵·步军司寨》、《殿司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第3494—3496页。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五《行在诸军马草》，第335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三〇，第7174页。

路宣抚使张浚节制”；九月，接受张浚的奏请再“诏令殿前司左军全军，马军司于前军、左军内各差二千五百人，令刘源统押，步军司差五千人，并前去扬州屯驻，听江淮宣抚司使唤”；隆兴元年四月，又“诏遣殿前司右军统制阎德统辖殿前、步军司人马前去，听张浚节制”。张浚遂得“合殿前、江淮兵八万”，出师北伐。当宋军兵溃符离、战局逆转之后，宋廷于是年十月“诏令殿前司于护圣马军差一千人骑，步军差入队二千人、不入队一千人，往江淮都督府”；隆兴二年七月又“令步军司郭振全军人马，于八月上旬择日起发，前去淮东屯驻”。九月“诏殿前司护圣马步军、神勇军、策选锋军、前、后、右军人马并行起发。候到，令淮东宣谕使唤钱端礼差殿前司前军先次往扬州，右军往真州屯驻。其余军马，并于镇江府，听候朝廷指挥”。直至战事基本结束，隆兴二年十二月，枢密院勘会“三衙官兵见屯戍两淮”，宋廷方诏令“殿前司官兵先次班师，步军司节次起发”<sup>①</sup>。

在战斗当中，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统率殿前司各部，先是在灵壁击败金将萧琦所统“马军三千五百余骑”，又在宿州“遣马军四边伺连”，与金兵五万余主力骑兵相对抗，“伪元帅领五万余众，并系马军，冲突官军，箭凿如雨”，李显忠“劝励将士，极力斗敌，马、步军既拥而上，转战迴旋百余合。申时后，贼兵败北，追十余里，杀死不知其数”<sup>②</sup>。“杀死不知其数”，当然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足证其时南宋殿前司、马军司等三衙的骑兵，确乎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与金兵铁骑角逐沙场。至于此后宋军兵溃符离，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指挥体制不善所导致的内讧上<sup>③</sup>。

开禧北伐，两淮主战场上的宋军主力同样是三衙各部，南宋在战前即“调三衙兵增戍淮东”<sup>④</sup>，“韩侂胄开边，始用殿帅郭倪、马帅李汝翼，发三衙禁旅，与江淮之师有事于宿、泗”<sup>⑤</sup>。淮西方向围攻宿州的主力是马军司，由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亲自统率；淮东方向则以殿前司和步军司的二万余精锐为主力<sup>⑥</sup>，殿前副都指挥使

① 《宋会要辑稿》兵九之一五、一六，第6913页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和战始末》，第465页 《宋会要辑稿》兵九之一五、一八，第6913—6914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四四、四五、四六，第7014—7015页。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一之四记因符离溃败而受处分的众将，其中殿前司有统制官三员：武德大夫左士渊，正侍大夫、和州防御使张训通，武德大夫韦宝，统领官三员：武德郎李彦孚、武功大夫王伦、武德郎董安；马军司统制官四员：起复武功大夫张师颜，左武大夫、果州团练使秦佑，武功大夫刘正宝，起复武功大夫、惠州刺史范旺。第3973页。可见，隆兴北伐，宋军确是以三衙殿前司和马军司为主力，再辅助以江上诸军建康、池州两个都统司的兵力。

④ 《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宋宁宗二》，开禧二年四月己巳，第2054页。

⑤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一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五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宋会要辑稿》兵六之七记开禧二年四月郭倪奏请“乞于殿前司通见出戍人，共犒差精锐、壮健正带甲二万人。”宋廷随即令殿前司抽调七千人、步军司二千人前往。第6858页。击败金兵的灵壁凤凰山之战，据郭倪奏报，立功的殿前司统制官有：选锋军统制毕再遇、中军统制何汝霖、前军统制耶律域。可见，是役殿前司至少出动了选锋、前军和后军三个军的主力。见《宋会要辑稿》兵二〇之六，第7104页。

郭倪兼镇江都统制坐镇扬州。在战斗中,马军司后军统制田俊迈部表现得最好,在宿州城下多次击败了金的骑兵,“虏遣骑迎战,俊迈与倬麾下将孟思齐合力败之于西流村”<sup>①</sup>,以至于金兵对其必欲得之而后快。殿前司的选锋军统制毕再遇更统领精骑,迭挫金兵,成为威震南北的名将。战局恶化之后,南宋又“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领兵驻真州,援两淮”<sup>②</sup>。

可以说,南宋数度试图北伐中原,正如虞允文所言:“用兵不可以无马,市马不可以非其地。有百万之兵,无马以壮军势,而用其胜力,于追奔逐北之际,与无兵同。”<sup>③</sup>三衙骑兵力量的扩充,在其时的战争条件下,堪称是南宋北伐中原一个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除此之外,从宋孝宗朝开始,三衙逐步负责扬州、天长、六合、高邮等地的防务,如殿前司的游奕马军就屯戍在扬州<sup>④</sup>,这些地区进可攻、退可守,是江淮之间屏障长江的江北要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应淮东制置司的要求,宋廷又令殿前司前后选派“精锐马军”一千人骑,由殿前司的统领官彭佖指挥,前去“内控归附,外接夷虏”的边境第一线重镇楚州驻守。这支骑兵部队,遂成为楚州守御的中坚力量,被淮东制置司誉为“委是纯熟”、“缓急可仗”<sup>⑤</sup>。

对内,绍兴和议之后,对南宋朝廷而言,大力扩充三衙和削弱主要从岳飞、韩世忠、张俊三支大军演变而来的江上诸军,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目的都是强干弱支以实现中央集权。从绍兴和议签订开始,尤其是乾道至嘉泰期间,在三衙骑兵力量持续增强的同时,江上诸军各都统司的骑兵反而日趋萎缩,不仅是马源“川马”无法与三衙的优质“秦马”相比,而且普遍出现了战马严重供应不足的问题。如建康都统司的情况就长期是“诸军见管战马,大段数少”,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该都统司参加教阅的仅有“战马二千匹”<sup>⑥</sup>;镇江都统司也是“本司诸军战马,昨自虏人侵犯之后,累经战阵,委是阙少”;鄂州都统司亦“诸军战马,旧管万余匹,累经战阵,见管数少”<sup>⑦</sup>;江州都统司仅有战马“不及千疋”,池州都统司“战马不多”<sup>⑧</sup>,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四川诸军兴州都统司等四个都统司的情形亦大致如此。如此鲜明对比的出现,显然就是南宋马政重三衙、轻江上诸军政策,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① 《宋会要辑稿》兵九之二一,第6916页。

② 《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宋宁宗二》,开禧二年十一月庚辰,第2058页。

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马政》。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一,第7303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一、五二,第7318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第7160页;《文忠集》卷一四八《录白亲札付郭钊》。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第7160页;兵二五之二一,第7210页。

⑧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一五,第7234页;兵二三之四,第7161页。

南宋三衙马政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有：

1. 取马途中纲马倒毙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相比于茶马司，三衙自行取马，确实大大降低了马匹在路途中的死亡率，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如乾道七年殿前司和马军司的各一纲马纲，就分别倒毙了 19 匹和 13 匹之多；乾道八年殿前司使臣李师绩所押纲马，“死损几半，见存者皆瘦瘠不堪”；乾道九年殿前司准备将李宣“往汉阳军排发纲马，在监倒毙既多，又更在路死损”<sup>①</sup>。嘉定九年，据当时臣僚所言“国家市川、广之马，以备战阵，所过郡县，批支草料、钱粮，驿程不过五六十里，初无驮载驰骋之劳，顾乃羸瘦骨立，或在路耗损。”<sup>②</sup>

问题的症结：一是三衙马纲官兵选派不精，鱼龙混杂，如乾道七年八月枢密院所言“勘会三衙、江上诸军取马官兵，并不拣择差拨，往往不切用心，致令倒毙数多。”<sup>③</sup>二是三衙马纲军纪不严，赌博盛行，而官兵的赌资大多来自“盗柴”，即盗卖供应纲马的粮草，遂人为地导致马匹因营养不良而倒毙。嘉定九年七月，就有臣僚具体提出“纲兵率皆中夜起程，黎明至驿，一日之内，无所用心，惟事饮博。所请马料，随即货柴，以资其用。马之刍秣，何暇顾邪？无怪乎马之饥饿羸瘦，以致耗损也。”<sup>④</sup>三是纲官夹带私马，借机侵吞官马草料，“其押马官附带私马，却于正马草料内减剋均养”<sup>⑤</sup>。

2. 三衙军官私占战马。军官私占战马，是南宋三衙军中十分普遍的一大顽症，如绍熙二年（1191）宰执就专门“进呈臣僚札子多占战马”；嘉泰二年殿前司左军统制王宁被降两官，降充副将，“以殿前都虞候郭倪言其多破阵马、冗占白直、偷减草料、盗取官物”<sup>⑥</sup>。嘉定六年（1213）又有臣僚上奏：三衙“将佐之马，往往取之马军”，当时的一名统制官，往往就能以“科马”的名义，私占战马达到四五十匹之多！<sup>⑦</sup>按照南宋三衙的统制官起码有二十员以上来推算，被私占的战马至少就有千余匹，占三衙总战马数的 5% 以上，若再加上三衙的管军、统领和正副将等其他将领，私占战马的数量肯定极其惊人。嘉定六年，南宋下诏“统制官止许差破战马六疋，统领官差破四疋，马步军正副、准备将各止差破两疋。其减下马拘收，从公拨付入队官兵，如法养喂。仍仰严切铃束兵将官，今后不许辄于官兵名下差拨换易。”<sup>⑧</sup>但这仅仅是一个并不严厉的限制性的规定，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六，第 3331 页；兵二五之四〇，第 7220 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二，第 7237 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三三，第 7216 页。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二，第 7237 页。又，兵二六之二三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且官给粮草，多是折钱，吏卒侵用去取（马）[焉]。”第 7238 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〇，第 7210 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第 7227 页；职官七三之三一，第 4032 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一，第 7237 页。

⑧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一，第 7237 页；又见《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第 1395 页。

三衙军官私占战马，正如宋光宗所说“军帅多占马，非时利其所得，又以好马奉权贵。此弊不可不痛革。”臣僚也谈到“岂特占请马料，每一疋必有一卒以预其名，而盗取其食钱以入己者。”<sup>①</sup>其目的有二：一是私吞粮饷。除了私占战马的草料钱之外，因为骑兵每人每天的伙食钱是300文，而步兵只有100文，军官每私占一匹战马，就可以侵吞其中的200文差额。二是贿赂、献媚权贵。为求个人升迁，三衙将帅或者是私下相送，或是以“借”的名义，以奉送战马来结交权贵。

对此，南宋朝廷也曾下令试图禁止，如绍熙二年六月下诏“访闻殿、步司战马，百司官吏辄行私借乘骑，显属违戾。仰主帅日下禁止，毋得徇情应副。如或仍前借差，具名闻奏。”<sup>②</sup>庆元元年九月，宋廷又严令殿前司和步军司“不许私借战马与诸处官司”，已经借出的“限三日拘收诸处官司见借官马，具申枢密院”，“仍约束诸军兵官，今后或有违戾，重作施行，必罚无赦”<sup>③</sup>。但显而易见，在权贵揽权、“士大夫无耻”成为南宋中后期政治常态的大背景之下，这些诏书都不太可能收到实际的成效。直到南宋末年，实际情况依然是：三衙战马“贵官之占借已过半”，“自执政、侍从、台谏、给舍而下，以至省官、环卫、勋戚、阍尹之属，占借之马，其数甚广。往往预指其姓名，阴记其毛色，如寄诸邻而取之”，而且“其占借之骑，皆西马之骏”<sup>④</sup>。

3. 牧马期间战马大量死亡。绍熙五年，步军司上报枢密院，步军司该年度放牧期间马匹死亡共计61匹，这是“淳熙十一年至绍熙四年十年之内，毙马最少”的年度，总辖官、前军统制高宗周也因此“特转一官”。可见，三衙各司其他年度倒毙的马数要远高于61匹。事实就是如此，如绍熙元年十一月，南宋一次就下诏处分了“后军统制雷世忠、后军统领王处久、前军统领杨世雄、选锋军统领李显明”等多达四名的三衙统制、统领，“各特降一官”，原因就在于他们“坐总辖牧放，马倒毙数多故也”<sup>⑤</sup>。这其中固然有三衙牧场所在的浙西地区，“地气卑湿，并喂饲菱草，多致病瘦”<sup>⑥</sup>等客观原因，但正如时人所批评的“自殿最不严于主帅，则牧养之纲领废；自优恤不加于士卒，则牧养之节目废。”<sup>⑦</sup>三衙牧马时“马政不严”等人为了因素，显然更为重要。

4. 克扣马料。乾道四年，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舜举就因“不支马料钱”，被降了一级官阶，这些马料钱，当然是被李氏中饱私囊。又，绍熙元年殿前司护圣马军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第7227页；兵二六之二一，第7237页。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一八，第3014页。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八，第7230页。

④ [宋]佚名撰《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二五《马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七，第7230页；职官七三之三，第4018页。

⑥ 《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三四，第7141页。

⑦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二五《马政》。



权统制李世存，也“坐虚作买草到场，盗破官钱入己”<sup>①</sup>，被解除了统制官的职务。毫无疑义，两人的所为在三衙军官中绝非个案，只是二李败露了而已。

上述种种问题，南宋各朝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从整体上看，大致可以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三衙马政基本上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转；而从此后的嘉定年间开始，正如时人所慨叹的“窃见茶司之马，每岁发卒取隶诸军，积而计之，宜不可胜数，而诸军之马曾不加多”、“最可恨者，交卸之后，而掌者不复爱惜，死者至无虚日，特以变易名色，充市肆之烹宰而已”，“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sup>②</sup>，三衙马政江河日下，弊病百出，终至不可收拾。

更为关键的是，南宋三衙马政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即完全依赖购买，而且马源单一，宕昌寨的地位自始至终是别无替代，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北卖马诸蕃部，或是哄抬马价，或是以次充好，甚至肆意强卖、寻衅滋事，南宋受制于人，只能是被动地应付<sup>③</sup>。庆元年间，特别是嘉定七年（1214）金宣宗南迁之后，金遭到蒙古的猛烈攻击，长城沿线等北方马场相继丧失，也在宕昌附近的洮州和河州一带，以白银和粮食向蕃部置场买马<sup>④</sup>，对当地马源的竞争和争夺日趋激烈，南宋宕昌寨马场已经出现了“马至秦司者差罕矣”<sup>⑤</sup>的惨淡局面。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宋、蒙古战争爆发之后，川、陕地区首当其冲地被蒙古铁骑蹂躏，南宋马政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南宋国运亦急转直下，趋向终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06CZS006）、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宋代兵马司制度研究”之阶段性成果。文章初稿成于2008年，在修改过程中承蒙王曾瑜先生、李华瑞教授和匿名审稿专家赐教，特此致谢。

（作者范学辉，1970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09年10月20日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一之二〇，第3981页；职官七三之三，第4018页。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二，第7237页。《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二五《马政》；〔宋〕林駟撰《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二《马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三记乾道三年兵部侍郎陈弥作言“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藉马之为用，故驽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蕃蛮久恃圣朝宽大，一拂其意，必起纷争，官吏亦懼生事，无敢谁何。”第7161页。

④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马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川秦买马》，第426页。

⑤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十二》，第1394页。